

向邓小平学习

XIANG
DENGXIAOPING
XUEXI

沈传亮 主编



人民出版社

向邓小平学习

XIANG
DENGXIAOPING
XUEXI

沈传亮 主编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吴继平

责任校对:史 伟

装帧设计:吴燕妮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向邓小平学习 / 沈传亮 主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4.9

ISBN 978-7-01-013848-0

I. ①向… II. ①沈… III. ①邓小平理论—学习参考资料 IV. ①A8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83059 号

向邓小平学习

XIANG DENGXIAOPING XUEXI

沈传亮 主编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东城区隆福寺大街 99 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14.5

字数: 182 千字 印数: 00,001—10,000 册

ISBN 978-7-01-013848-0 定价: 36.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东城区隆福寺大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 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 如有印制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 (010) 65250042

目 录

第一章 向邓小平学习求实精神

- 1.“我是实事求是派” /2
2. 改革开放的成功“靠实事求是” /6
- 3.“走自己的道路” /9
4. 毛主席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 /14

第二章 向邓小平学习情系民生

- 1.“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 /20
2. 小康是专门为百姓设计的发展策略 /30
- 3.“小平，您好！” /36

第三章 向邓小平学习世界眼光

1. 外国的长处都要学 /44
2. 中美搞好关系太重要了 /51
3. 只握手、不拥抱 /56
4. 和平与发展是主题 /61

第四章 向邓小平学习领导艺术

1. 想大事、抓大事 /68



2. 干起来再说，不对抓紧改 /74
3. 看准了就要下决心，不要动摇 /79
4. 办事要抓关键 /84

第五章 向邓小平学习方法策略

1. “摸着石头过河” /92
2. 不争论，允许看 /99
3. 抓住时机，发展自己 /105

第六章 向邓小平学习调查研究

1. 有调查，才有发言权 /120
2. 调查就是要解决问题 /122
3. “决定数字就是决定政策” /128

第七章 向邓小平学习乐观心态

1. 理想信念很重要 /136
2. 心态保持乐观 /141
3. 胸襟要宽广 /146

第八章 向邓小平学习大局观念

1. 打光了也要站住脚 /154
2. 发展要有两个大局 /159
3. 带头搞退休 /165

第九章 向邓小平学习战略思维

1. 抓紧培养接班人 /174
2. 四项基本原则是成套设备 /182
3. 实施“三步走”战略 /187
4. “一国两制”是伟大创造 /192

第十章 向邓小平学习顶层设计

1.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204
2. 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 /209
3. 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 /213
4. 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217

后 记 /225





向邓小平学习
Xiang
Dengxiaoping
Xuexi

第一章

向邓小平学习求实精神





“在习惯了毛泽东的哲学宏论和形象比喻，以及周恩来儒雅庄重的职业精神之后，面对邓小平言辞辛辣、单刀直入的作风，偶尔犀利反讽的话，不喜欢空谈理论而喜欢着眼于极度实际问题时，我花了相当一段时间才把自己调整过来。”这是美国原国务卿基辛格在多次与邓小平打交道之后的感叹。基辛格认为邓小平的“实事求是作风把中国从走历史捷径的大梦中唤醒，重回必须依据宏图伟略按部就班实现历史的现实世界中。”^[1]邓小平自认为是“实事求是派”，他曾因为坚持实事求是而在政治生涯中遭遇重大挫折，也曾因为坚持实事求是带领中国人成功开辟中国道路。

1.“我是实事求是派”

邓小平说自己既不是保守派，也不是激进派，而是实事求是派。在1992年年初的南方谈话中，他说比较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实际上，实事求是出自中国古代《汉书》。毛泽东结合革命实践的新鲜经验，对实事求是进行了新的解释。毛泽东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区内外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2]毛泽东正是靠实事求是带领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开辟出一条中国特色革命道路。邓小平很好地继承和运用了毛泽东的求是思想。

邓小平因坚持实事求是地干工作，曾受到政治打击。1933年年初，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迁入中央苏区后，“左”的政策开始在中央苏区得到贯彻。思想偏“左”的领导人反对毛泽东等在苏区所实行的符合实际的政策。他们不但将毛泽东排斥出红军领导岗位，而且对于其他抵制“左”的

政策的人大加排挤、打击，他们还派出代表到各苏区贯彻落实“左”的政策。1933年2月，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由于不赞成“左”的政策，被斥之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和对革命悲观失望的错误，即所谓“罗明路线”，并受到撤职处分等种种打击。时任江西会昌中心县委书记的邓小平等人坚决贯彻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面对敌人“围剿”，不拼硬、不搞“堡垒对堡垒”；他们不同意“动员一切经济力量为了战争”的口号，主张主力红军要把打土豪筹款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在土地问题上，他们反对“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错误主张，坚持执行按照人口平均分配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正确政策。正是因为在行动中坚持实事求是，抵制了王明的教条主义错误。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4人受到了左倾领导人的批判。他们4人被称之为“江西罗明路线”的“领袖”。他们虽据理力争，但依然在临时中央和中央局特派员主持的江西省委工作总结会上，被撤销了职务，还当众被缴了枪，被派去基层改造。^[3]邓小平被撤了职，得到“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随后，邓小平被派到乐安县属的南村当巡视员。到了乐安不足十天，有关领导怕边区不安全，又让邓小平回到省委。这是邓小平政治生涯三落三起的“第一落”。毛泽东在“文革”期间，曾提到邓小平是“毛派的头子”，使得邓小平第二次快速复出。复出后的邓小平注重“促生产”，大力进行整顿。期间，毛泽东让其对“文革”做个决议，意在要肯定“文革”。邓小平以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魏晋，何知有汉”，推辞了。毛泽东显然对邓小平的态度不很满意。邓小平这一实事求是的做法与他的第三次被“打倒”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

邓小平一直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新中国成立后，他在主政大西南期间，就根据西南实际情况采取了很多措施，推动了西南地区发展。“大跃进”后，很多地方出现挨饿现象。有的地方为了填饱肚子，悄悄把地分给老百姓，搞起了变相的“包产到户”。对这一行为，中央有不同意见。



有人认为，包产到户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包产到户容易带来农村的贫富分化，还会出现地主和农民的对立。有人则认为，包产到户，把地给农民种，土地还是属于国有的，不仅不会损害国家利益，还能够调动农民积极性，度过饿肚子的困难时期。但两种意见，争论激烈。作为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对此说：“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这都是些初步的意见，还没有作最后决定，以后可能不算数。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4〕}这段话后来被演绎为“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猫论”，形象表达了邓小平的求实精神。20世纪80年代初，有位领导曾问邓小平，对“黑猫白猫”这个说法现在怎么看？邓小平回答：“第一，我现在不收回；第二，我是针对当时的情况说的。”^{〔5〕}

“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随着江青等人1976年10月6日的被捕在事实上宣告结束。如何收拾残局，如何走出乱局，成为中共面临的重大问题。有的人认为要实行“文革”的做法，从而提出“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在治国理政上，他们强调“抓纲治国”，实际上还是要走老路。有的则顺应民意，既不走老路，更不走邪路，而是从中国实际出发走出一条新路。邓小平就是其中的代表。他在“文革”期间，被打倒两次，思考了很多问题。照老一套干，老百姓也不会答应。因此，在“两个凡是”提

出后，邓小平明确表示“两个凡是”不行。“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6]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过程中，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批评某些人天天喊高举毛泽东思想，实际上是“假”高举。邓小平还找到当时的中宣部部长，说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找到当时的中组部部长说，不要担心，争得好，根子就在“两个凡是”。真理标准问题之所以出现争论，实际上就是“两个凡是”和“实事求是”之争。在邓小平等人支持下，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成为人们破除僵化观念、坚持实事求是的一次精神洗礼，为实现转折、推进改革开放注入了强大思想动力。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召开的长达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发表了重要讲话，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思想，提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段话实际阐明了实事求是的极端重要性。

但即使是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产生了巨大的解放思想威力，但很多人对待毛泽东却陷入了非此即彼的零和思维。有的人无比维护毛泽东，把毛泽东视为没有任何错误的伟大领袖，奉为神灵；有的人恰恰相反。这种不同声音不仅民间有，中央也有。而如何对待自己的领导人，在国际共运史上都是一个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大问题。斯大林的继任者把斯大林形容为魔鬼，从而对苏共形象产生了极大损害，至今依然无法修复。如何正确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确实考验着中共领导人的智慧。邓小平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实事求是，一方面指出伟大领袖也是有错误的，要求领袖不犯错误是不现实的；一方面指出毛泽东是伟大领



袖，为党、国家和军队建设都做出了巨大贡献，也犯过严重错误。但与伟大成就相比，错误是第二位的。从而较好地处理了毛泽东的功绩与过失的问题。中共为此专门召开了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统一了全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从而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形成了正确看待毛泽东的最大共识。

针对有人议论自己的派别色彩，1987年3月3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国务卿舒尔茨时表示：“国外有些人过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别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错；如果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所以比较正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7〕

2. 改革开放的成功“靠实事求是”

邓小平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取得成功主要是因为靠实事求是。他指出，“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8〕

从农村改革来看，不少人以为中国农村改革一帆风顺，实际上并非如此。“文革”结束后，中国推动农业发展显然不能再靠盲目“学大寨”了，但如何改革却远远没有达成共识。有的省份为了度荒，悄悄把土地借给农民耕种，变相搞起了包产到户。令决策者十分意外的是，农民的积极性迅速被调动起来。包产到户产生了巨大魔力，粮食产量提高很快。农民从以前的不够吃，很快向“吃得饱”迈进。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很多地方开始悄悄搞起包产到户。但中央决策层并未达成共识。在标志着改革开放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还明确规定“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有人甚至认为，把地分给农民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1980年召开的省、市、自治区一把手会议上，为此还吵得一塌糊涂。直到1982年，在邓小平、胡耀邦等人的支持下，中央制定并发布了关于农业发展的中央一号文件，才逐渐承认了农民包产到户的社会主义性质，后来包产到户的名字定

位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因此，邓小平在后来说，“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不只是经济特区问题，更大的问题是农村改革，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开始的时候只有三分之一的省干起来，第二年超过三分之二，第三年才差不多全部跟上，这是就全国范围讲的。开始搞并不踊跃呀，好多人在看。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慢慢就跟上来了。”〔9〕邓小平的这番话实际表明，农村改革成功是尊重农民意愿，用事实说话。农村改革短短几年就取得重大进展，1984年粮食总产量超过了8000亿斤，全国人均粮食超过800斤，比“文革”结束时人均多了200多斤，农民温饱问题基本解决。这时，不同意见渐渐消失。

农村改革的巨大成功，为城市改革提供了很好的基础。1984年，中共决定把改革的重点转向城市。如何有序尽快推进城市改革，成为中共上上下下关心的重大问题。在胡耀邦等人领导下，中央于1984年4月成立了文件起草小组，专门起草以城市为重点的改革方案。经过起草组的艰苦努力，以城市为重点的改革文件于10月份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稿子。1984年10月20日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顺利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城市改革的总体方案，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之所以这次会议能够突破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对立，主要和改革开放的实践有关。农村改革取得成功之后，富裕起来的农民开始创业，办起了乡镇企业，广东高要县产生了养鱼大户、安徽芜湖年广久把瓜子卖得风生水起。城市为了解决就业问题，也允许返城知青和待业青年自谋职业，城市里开始出现个体户等经营形式。北京前门大街上卖大碗茶的尹盛喜就是其中的知名代表。这些改革的实践迫切要求中央的理论创新，用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根本无法解释20世纪80年代的新生



事物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决定吸纳理论界的建议，积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才写出了这样的改革文件。邓小平对这次全会和文件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揭示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不是说四个坚持吗？这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否则是‘四人帮’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解放思想，我们老同志有这个任务。这次的好处是，中央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三个委员会的同志都赞成这个文件，看到了现在发布这个纲领性文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是个好的文件。”〔10〕

不仅改革靠实事求是，开放也靠实事求是。邓小平积极倡导对外开放。他以70多岁的高龄，在“文革”结束之后，不辞辛劳到访日本、朝鲜、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美国等国家，访问期间，就很多重要问题进行了商谈，为中国实施对外开放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这时，党和国家领导人也纷纷出访。“不去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他们看到了中西巨大差距，也看到了中国开放的机遇，遂决定实施对外开放政策。1978年、1979年举行的两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习仲勋在代表中共广东省委发言时都向中央建议给广东更多的自主权发展经济，并提出选择几个地方试点的意向。〔11〕邓小平赞成习仲勋的这一提议，并提出还是叫特区好，过去我们的陕甘宁就是特区。中央没有钱，你们要杀出一条血路来。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广东、福建先行先试。国务院领导人谷牧带队到广东考察调研，形成了设立经济特区的思路。经过一系列准备，1980年设立了深圳、珠海、厦门、汕头四个经济特区。经济特区主要实行市场化取向的经济政

策，市场作用开始显示出巨大的魔力。经济特区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但由于以前没搞过，一没有经验，二没有实践，所以刚开始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有的地方走私贩私现象比较严重。这时，关于经济特区就有了不同的声音，特区被影射为近代中国上海的租界，说什么“只有红旗是红的，其他都是白的啦”，有人甚至建议在特区周围拉上铁丝网，以免资本主义的东西进来。国务院负责特区工作的领导人谷牧曾就此说“很有点秋风萧瑟的味道”。1982年11月，国务院和有关部门形成了《当前试办经济特区工作中若干问题的纪要》，明确指出：“举办经济特区，是我国在新的历史时期贯彻执行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措施”。并明确经济特区工作由谷牧负责分管。^[12]这时，经济特区才“柳暗花明”。1984年年初，时刻关心对外开放的邓小平到经济特区转了一圈，说特区是他主张办的，过来看看办得怎么样。实际上，这次邓小平到深圳、珠海经济特区来，就是要调查研究，看看特区搞得怎么样。在他的眼里，“时间就是生命、效率就是金钱”的口号特别振奋人心，特区建设和发展一片生机勃勃。因此，邓小平为深圳、珠海特区题词说“深圳的发展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珠海经济特区好”。这是对特区发展的强有力支持。邓小平回京后，在会见胡耀邦等中央领导人时说，对外开放的政策要放而不是收，还要考虑开放海南岛的问题。1984年5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把大连、秦皇岛、青岛、北海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确定为开放城市，实行市场取向政策。邓小平决定扩大对外开放步伐，是在实地调研基础上得出来的。

正是这种求实的态度、务实的作风，使得邓小平能不失时机地果断提出改革开放任务，推动中国改革开放不断走向成功。

3.“走自己的道路”

毛泽东时代，中国人在社会主义建设上就想走自己的路，但很遗憾并没有走出来。邓小平时代，在准确把握国情基础上，成功开辟出一条中国



道路。

这条路来之不易，是在中共从实际出发的结果。以务实著称的邓小平在接见外宾或出国访问时，都敢于揭短亮丑，承认中国落后。因为认清实际是前进的基础，只有承认落后才能认清现实。邓小平在“文革”结束后，以务实心态在各种场合大胆讲中国落后，以激起人们的奋斗劲头。1978年9月12日，邓小平在同朝鲜领导人金日成会谈时就提出，“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什么叫现代化？五十年代一个样，六十年代不一样了，七十年代就更不一样了。”^{〔13〕}9月16日，邓小平指出，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关键还是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政治问题，是思想问题，也是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现实问题。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的事业才有希望。1978年9月16日，邓小平在长春听取中共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发表讲话。他说：“现在在世界上我们算贫困的国家，就是在第三世界，我们也属于比较不发达的那部分。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14〕}邓小平在1978年10月访日期间，在一次谈话时还提出，“首先必须承认自己落后。本来很丑，就不应该表现得像美人一样。”

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邓小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给出了自己的看法。1978年9月，邓小平在视察鞍钢时提出：“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

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二十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15〕}

后来，邓小平指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显然，这里的“不够格”是与马克思所设想的建立在高度物质发达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相比的。这是因为，在马克思眼里，社会主义应该是建立在物质极大丰富、精神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之上。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史表明，马克思的设想与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是有较大出入的。

既然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那么就不一定拘泥于马克思的原来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设想，就要求执政者从实际出发，来制定相关政策。毛泽东早在1956年就提出来要走自己的道路，但遗憾的是没有成功探索出一条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邓小平接过接力棒继续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之路。

如何来向全国人民说清楚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呢？1977年10月，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不久就指出：“人们都说中国是个大国，其实只有两点大，一是人口多，二是地方大。就发展水平来说，是个小国，顶多也是个中小国家，连中等国家都算不上。”^{〔16〕}1979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叶剑英作的《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明确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完善，经济和文化还不发达”，“还处在幼年时期”，“在我国实现现代化，必然要有一个由初级到高级的过程。”^{〔17〕}

在中共中央重要文献中，1981年6月举行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首次提出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在初级的阶段”。1982年召开的中共十二大进一步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并指出这个阶段的根本特征